



大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十一次全体会议

1996年9月26日,星期四,下午3时

纽约

代理主席: 乌尔维索·潘亭先生 (洪都拉斯)

嗣后: 拉扎利先生(主席) (马来西亚)

嗣后: 威尔莫特先生(副主席) (加纳)

主席缺席, 副主席乌尔维索·潘亭先生(洪都拉斯)主持会议。

下午3时开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现在请斯里兰卡外交部长, 尊敬的的拉克什曼·卡迪乐加马尔阁下发言。

卡迪乐加马尔先生(斯里兰卡)(以英语发言): 对斯里兰卡来说, 我们由一个亚洲国家的杰出代表主持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荣幸的事件。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长期享有最真诚的友好关系。我们向主席表示祝贺, 并给予他我们无条件的支持。我们也想对葡萄牙的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阁下对历史性第五十届会议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

去年在我们的特别纪念会上, 我们保证留给二十一世纪一个装备好、资金足以及结构合理的联合国, 在便有效地为以其名义建立的人民服务。这种保证我们一定要遵守。世界各国人民在本届会议期间以及以后将密切注意

我们, 看我们怎样用行动实现我们去年用动听的语言许下的诺言。

本组织面临的财政限制使一度令人头脑发热的、要求激烈改革的激情冷静下来。清醒的实际性论断现在看来在所难免。但我们必须记住, 正如斯里兰卡总统去年指出的那样, 我们的任务是

“增强联合国的功能, 而不仅仅是实行节约、精简机构。”(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届会议, 全体会议第35次会议, 第9页。)

联合国一个切实可行的资源库不能仅仅通过实现更大的财政责任制和合理管理来获得, 而且更迫切的是要通过所有会员国认真致力于遵守它们根据《宪章》规定必须遵守的财政义务。

我们同意, 我们组织的秘书处需要进一步合理化。我认为, 本组织现在已足够成熟, 能够在该裁减的地方进行裁减。涉及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必须精简、有效和易于管理, 这并不是说它们不容触及。慎重的、有规划的节俭能够并且已经得到实行。我们必须改革而不是毁坏本组织。联合国首先极为需要一个稳固的财政基础。没有这个基础, 将不会有建设我们大家都期望的精简的、高效率的、

和有效的世界组织的前景。我们只会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就象建空中楼阁。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工作小组及和加强联合国系统问题工作小组已经取得某些进展，尽管在主要核心领域尚未取得最后结果。不过我们认为这些努力应该下去。我们应该加倍努力达成一致意见。

必须强调的是，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只要它们获得全体会员国的信任和保证它们的决定得到普遍接受就是可依赖的和有效的。关于安全理事会，我们认为今天的政治和经济现实，而不是昨天的军事力量，必须体现在对诸如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增加其总体成员的各个问题作出的任何决定上。

联合国既不作主人也不作奴隶。

首先，尽管有某些要限制国家主权的时尚理论，但本组织的成员国毕竟是主权的、独立的国家。每一个国家，不论多小多弱，都谨慎小心地捍卫其主权。因此，在联合国干预的地方，它必须明确限于《宪章》规定的范围内这样做。每个国家的同意与合作对确保联合国触及成员国领土的任何努力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保证联合国人员的安全，保证接受国人民的幸福和利益。

在发挥其解决冲突和缔造和平的作用时，我们的组织很有必要避免偏离正道而卷入内政问题和属于有关国家内政管辖的冲突中。本组织只能在有关国家的接受下才能发挥其作用。这种立场基于一个简单的道理，即相关国家首先最具资格解决这些问题，因它们熟悉这些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否则，联合国的行动只能起到反作用，而且可能导致冲突的激化。联合国的使命也不应该用来为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服务。联合国不应该用来当作一种特权，让不体现成员国普遍意愿的事业具有合法性，而安全理事会应该永远按照成员国的普遍意愿行事。

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重申我们对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集体尊重。世界上的较小国家应该经常得到较大国家的保证，保证它们的利益得到保障，主权受到尊重。小国只能向联合国寻求对它们民族利益的保护。

首先，从实际情况说，发展中国家由于代表不足，需要增加它们在安理会的人数。第二，联合国组织中有些会员国发表支持安理会的常任席位的论点，其说服力不亚于50年前为当前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取得特别地位的论点。

我国代表团还注意到就主题为《和平纲领》的进行有益讨论。我们感到有必要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工作。

《发展纲领》是一个具有关键性重要意义的题目。它强调联合国组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我们注意到了在这种努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同时我们也应该重申我们的承诺，加快在这个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提高和稳定有重大关系的领域的进展。

我现在谈谈恐怖主义的问题。“恐怖主义分子”这顶帽子往往被不公正地加在真正民族解放运动的头上，例如，反对外国占领和种族隔离的斗争的运动。这些组织的合法性已经被联合国所承认。这些组织曾经和我们坐在一起，在这里讨论迫使他们采取武装行动的问题。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真正的人民运动现在已经作为正式会员国而占有联合国的席位。我们不应该把时间放在研究恐怖主义的全面定义上，以免使我们陷入的语义学的泥沼中而难以自拔。历年来，根据严峻的现实，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一致意见已经走向成熟。迫切需要的是将这种一致意见付诸实施。

全世界都知道，将近二十年来，斯里兰卡遭受了激烈的种族冲突的痛苦，耗尽了我国的精力。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对付一个武装集团，他们以暴力手段、诉诸恐怖主义，作为达到他们非法的目的的手段，以便肢解我们国家。这个名为泰米尔伊拉姆解放虎（泰米尔之虎）的集团推行了一系列的恐怖主义行为，在我国许多地区造成了死亡和破坏。从任何意义上看，这个极端主义集团决不能代表他们声称为之奋斗的人民。他们从来没有在选举中争取选民对他们的授权。他们置身民主的主流之外，而许多少数民族的政党却参加协商程序，以通过民主的手段解决他们的不满。

我们正在研究由我国政府提出的解决少数民族不满的一系列倡议，其中包括意义深远的对宪法的修改。

泰米尔之虎不相信和平谈判的道路，他们信仰枪杆的力量。他们害怕和平程序会使他们变得无足轻重，因此他们诉诸加强暴力。我们知道，从财政、装备和战争物资来说，他们的支持不是来自外国，而是来自国外的某些人。没有一个国家在言论或行动上支持他们。他们的支持，或者来自在富裕国家中生活和工作的泰米尔社区中某些误入歧途的成员，或者来自在许多发达国家中滥用东道国政府的好客，违法地进行敲诈勒索、贩运毒品、贩卖枪支、走私人口或其他非法活动。

在斯里兰卡，恐怖主义分子有意以平民为目标。他们炸毁了交通高峰时间的通勤火车和熙来攘往的办公楼，开枪袭击农村，造成了数千计的无辜平民的死亡，包括大批妇女和儿童。好几千人受伤或致残。正如斯里兰卡总统去年在五十年周年纪念会上所强调的，必须进行同心协力的国际行动，以对抗恐怖主义并迫使恐怖分子放弃暴力。

在那次会议上克林顿总统说，没有人能免受恐怖主义之害。

七国集团和俄罗斯在里昂召开的首脑会议，以及随后在巴黎召开的关于恐怖主义的部长级会议都采取了需要变为切实行动的大胆主动行动。会上提出的，关于恐怖主义轰炸的公约以及关于防止滥用庇护和难民法的建议都是及时的倡议。斯里兰卡期待着这次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

还需要作出努力，进一步加强1994年消灭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并赋予法律效力。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宣言；我们需要一个关于对抗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公约。国际同心协力的合作十分必要，以便保证不使恐怖主义分子在世界任何地方找到避风港。任何国家的领土都不应该被允许用来以任何形式鼓励或维持在另一个国家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尤其是在外国土地上进行直接的，或通过所谓慈善基金进行间接的筹款活动，都应予以禁止。如果由于国际上的冷漠，使恐怖主义得以滋生，那么恐怖主义就将毒化世界各国，削弱国际社会有义务维持的民主进程。

一个国家如果在向表面上看来只能引起好奇心的恐怖主义作斗争中置身事外或不承认负有责任，那将是目光

短浅的。我同意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敲，它是为你敲的。”恐怖主义分子有办法自由地跨越国界，使用化学武器，还十分可能有办法取得核武器。

全球相互依赖的现象无疑是一个现代的现实。然而，关于这一现象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真正影响，还有不同的看法。在关于发展的辩论中，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为一个单一的一经济系统的呼声成为发展中国家寻求与发达国家合作主要甚至唯一的选择。

但是合作一定不能与一致相混淆。必须考虑个别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性质，包括其政府面对的社会和政治上不由自主的情况。全球化涉及资金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化、国营企业私有化、冻结物价管制以及减低甚至最困难的人口的福利措施。对于把这些措施当作是经济训谕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措施不一定总是万灵药。

关贸总协定继承机构的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机构必须同情发展中国家对诸如外国投资流动的事项的关切，不应该把这些事项与其它组织和机构更为相关的问题牵扯在一起。同样，虽然健全的社会和环境政策对所有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任意施加的标准不应作为贸易歧视或隐蔽的保护主义的借口。斯里兰卡政府已经提供机会，使私人部门发展为增长的主要动力。斯里兰卡继续欢迎投资——与外国企业家在互利的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和技术合作。然而，如果完全在对一方极为有利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经济合作，那么这种努力将付诸东流。

尽管冲突局势造成压力和紧张状况，我们成功地使我国古老的民主机构和传统富有活力和强大。我们极为重视保护和促进人权。斯里兰卡政府在发展选举出的政府对人民的责任制时，已经采取加强法律框架和确保有效执行人权标准的一些措施。我们今年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是通过议会法案设立了一个人权委员会。我们确保该法案保证委员会行动的独立性，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包括监测、调查和咨询的职能。该法案还处理非国家行为者侵犯人权的赔偿责任问题。

我国政府已决定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任择议定书》，作为一系列国家措施合理的下一

步。斯里兰卡将因此成为已作出进步性决定,批准该《任择议定书》的少数国家之一。我国政府最优先重视斯里兰卡国际盟约下的义务,我们承诺继续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

放眼世界,我们看到,《代顿协定》之后在波斯尼亚终于听不到枪声了,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和平《协定》维持了下来。斯里兰卡谴责了波斯尼亚境内的暴行,尤其是不人道和残酷地对待穆斯林人。我们认为,除非把这些暴行负责人绳之以法,否则解决办法将是不全面的。

在中东,我们希望尽管该区域政治舞台中发生了变化,和平进程继续前进,不失去已获得的势头。斯里兰卡重申支持和平进程,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并创造该区域各国生活在安全边界内的和平与稳定的条件。我们赞扬美利坚合众国、其它有关国家以及该区域各国为实现中东和平目标作出的努力。

我们和国际社会一样关切利比里亚和布隆迪发生的危机,并强烈希望在这些困难的地区恢复和平。在我们南亚区域,我们的区域合作努力取得了进展。我们在去年12月庆祝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十周年,以南亚优惠贸易安排的生效欢迎该周年。南盟制订了在新的世纪最初几年实现南亚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本区域的私人部门进行密切合作。我们仍然坚定承诺始终不渝地关切在现实的时间范围内减轻,如果不是消除,我们各国的贫穷。

斯里兰卡日益趋向促进与我们看法一致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各国的经济合作。我们认为区域合作促进政治稳定和经济互利。我们最近成为印度洋周边倡议中的伙伴,我们已申请作为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成员。我们还期待,一旦完成必要的批准手续,印度洋海洋事务组织将进一步推动印度洋国家间技术及其它合作。在政治一级,斯里兰卡和联合国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正在根据该区域目前现实审查印度洋作为和平区的概念。

我愿现在提及斯里兰卡是创始成员的不结盟运动。今天—9月26日—是斯里兰卡特别重要的日子,它纪念伟大的爱国者,已故的S. W. I. D. 班达拉奈克,他在这天被暗杀。他在1956年至1959年期间担任总理。他开始了斯里

兰卡社会独特的和平、非暴力的改革。他1956年的选举胜利使我国的农村人口、穷人和广大群众获权利,并且制订了我国坚定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两天前,我们庆祝了不结盟运动正式成立35周年。班达拉奈克先生没有活着看到不结盟运动于1961年牢固地建立起来。但是在40年前的1956年,他在大会发言并且说:

“有人把我们当作“态度不明”的国家。本人坚决反对那种说法。我们的态度非常明显。我们明白表示要保持国际上的正当关系,我们明白表示要维护正义自由…”。

“防止战争当然是建立和平的必要因素,但是和平比防止战争积极得多,因为就其真正的意义来说,和平的意思是人类互相了解,互相友爱并且互相合作,并且事实上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本人觉得人类今日只有经过联合国这个机关,才能表现这种不可征服的精神,努力获得我们大家都殷切期望的那种和平、友爱和合作。(《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一届会议,全体会议,第590次会议,第248页。》)

他提倡的有关斯里兰卡的政策—我只提外交政策—由他的继承者西丽马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继续执行,班达拉奈克夫人作为总理出席了1961年贝尔格莱德的第一届不结盟首脑会议,后来主持了该运动在科伦坡的第五届首脑会议。

拥有113个成员国的不结盟运动是当今除联合国外的最大独立主席国家集团。它们团结起来抱着一个共同目标,即为其人民实现和平、繁荣和福利,其中大多数国家都属于第三世界。随着冷战的结束,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不结盟运动在没有明确今后作用情况下将会消亡。我们已能够消除这种误解并为运动制订新的方针。不结盟运动今天是作为第三世界和较小国家的代言人而出现的,这些国家都渴望在阳光下得到一席之地,并要求有机会实现经济发展和自我表现。

虽然《核不扩散条约》的期限已无限延长,但人们必须记住,完全铲除核武器是不扩散进程的最终目标。作为

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我国代表团一直努力确保禁止所有核试验,把它视为最终导致全面铲除核武器的一项临时措施。大会几天前通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案文是几年来耐心谈判的结果,但其规定并不包含一项对核裁军和彻底铲除所有核武器的坚定和明确的承诺。我们本来期望禁试范围真正无所不包而且生效规定不削弱条约本身的力量。我们期望《化学武器公约和有关细菌和毒素武器的《公约》》生效。

斯里兰卡仍然是致力于维护《宪章》神圣原则的联合国的一个忠实和执著的成员。尽管人们在联合国五十年期间认识到其各种弱点和失败,但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并信任五十年前成立的这个伟大的机构。这些污点毕竟只是全人类缺点和不足的反应,因此,我们不必感到沮丧或灰心丧气。我们坚定地认为,联合国仍然是这个世界的最美好希望。我们的确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其它办法或选择,因为放弃希望只有陷入失望的深渊。

但是,我们对联合国的希望必须以行动为基础,下定决心为这一伟大机构,确实也为全人类的最佳利益采取果断行动,而不受过去五十期间一直困扰我们的狭隘民族利益的污染。这绝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但除非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地决心确保联合国继续忠实地履行其创始者所设想的各项任务,否则我们就将在21世纪辜负我们的子孙后代。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智利外交部长何塞·米格尔·因苏尔萨先生阁下发言:

因苏尔萨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代理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表明,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洪都拉斯外交部长主持今天下午的会议,我们同该国有长期和牢固的友谊关系,而且我们这几天在安全理事会一直同该国一起工作。我还要代表我国祝贺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当选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

现在是联合国的一个过渡时期,作为过渡时期它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仍然信任各会员国的能力,信任联合国提供的这个宝贵论坛能够制订新的政策并建立新的管理体制,以便处理所有出现的国际问题。

我们在大会本届会议开始时要重新对《宪章》的各项原则和宗旨作出承诺。《宪章》是一项有效的文书,对于联合国的今后工作十分重要。联合国是一个因其性质,其各项原则和目标均超越任何国家的单一或民族利益,而代表全体利益的组织。

甚至那些批评联合国,希望可以削弱它或消减其作用的人也无法提出任何更好的聚会办法来处理日趋相互依赖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相信,人们不是要求削弱联合国,而是要求它在全球化的这个新领域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在这里合作是为建立真正的国际秩序可能作出的唯一选择。

国际和平与安全、自由贸易、基于平等增长的社会发展。保护环境、民主和人权都是多边系统今后工作的基本成分。这些都是联合国的行动领域,智利对此极为重视并将尽量努力为此作出最大贡献。

人们经常说,联合国生命头五十年所突出体现的超级大国对抗的结束使人们更容易创造和平与稳定的条件。但是,两级对抗的挑战以被从许多地方冲突中产生的新挑战所取代,这些冲突的特征常常是大规模侵害人权、毫无控制的人口流动和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形势,危急个人和国家的安全,最终还可能影响整个国际系统。

我们参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旨在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应有贡献,我们鼓励从事预防性外交,协商一致解决问题,执行遏止冲突的各项措施,并通过维持和平行动,和解和斡旋和平解决问题,而且还特别鼓励保护受影响人口和受害者。

同时,不容辩驳的是,和平与安全不仅仅是在国家间没有紧张和冲突。在同一边界内的人民间的和睦现在已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智利已建议安全理事会在存在国际社会反应强烈的真正或潜在大规模和有系统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和在早些时候建立的解决问题机制或机构无计可施时采取行动。

安理会最近通过了一些措施,例如关于保护库尔德族少数人的第688(1991)号决议、关于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受害人提供援助的第770(1992)号决议、关于减

轻制裁对伊拉克平民所造成负担的第986(1995)号决议,这些都是对什么是对和平的威胁作比较广泛和比较积极理解的几个例子,为帮助安全理事会处理这类冲突建立了可贵的先例。

这些标准也指导我们积极参与讨论布隆迪问题,最后通过了第1072(1996)号决议,为冲突各方走上和平解决分歧的政治道路制订了程序。我们必须继续密切注视这个局势的发展。国际社会、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不能够冒险,让卢旺达那样的悲剧再一次重演,必须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避免这种悲剧。

最近几个小时里,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可能影响到中东和平进程,今天我们还对这个危机表示十分严重的关注,我们自始至终都支持这个和平进程。我们敦促冲突各方不要让最近几年取得的成果付诸东流,应该在尊重已达成的协议和尊重各方人民信仰的基础上恢复对话。

建立稳定局势要求明确地致力于裁军、军备管制和限制。我国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我国最近批准了《化学武器公约》、参加了裁军谈判会议—智利一直希望参加该会议、批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我国不遗余力地支持建立无核武器区。

上个星期二,即1996年9月24日,我有幸代表我国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仅仅一年以前,本大会还在讨论仍然在南太平洋和亚洲进行的核武器试验问题。今天,我们举行会议,签署一项条约,永远禁止进行这种试验,该条约是包括所有核武器国家在内的本大会几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联合国常常被批评缺乏效率,我认为我们也应该赞扬我们的成就。

这些行动以及在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取得的进展有助于创造适当的条件,促进和平与安全,并且使国际社会将精力和物资资源集中于各国的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

维持和平行动是本系统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维持和平部队必须在明确界定和合法的任务框架内,争取取得结果。智利参加了在印度、巴基斯坦、中东、柬埔寨和科

威特进行的维持和平行动,我国目前正在参加联合国伊拉克特别委员会的活动。

然而,毫无疑问,应对这个机制进行调整,以适应目前的政治形势。为此目的,智利积极参与各项审议工作,研究如何改进规划以及提高反应能力,以处理萌芽状态的冲突。在所有这些方面,采取多边办法、采取各当事方同意并且由本组织提供资金的行动都将能保证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功。我们希望大幅增加我们对各种行动的贡献,例如我刚才所提到的各种行动。

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广泛理解就要求在社会发展、民主制度和促进人权领域采取果断行动。下个世纪的世界秩序将要求更加广泛的基本自由。下个世纪的全球社会已露端倪,这将是一个开放和多彩多姿的社会,物质潜力丰富,充满新的发展机会。现在所需要做的是创造条件,使各国人民和各国最充分地利用这个新的环境,使它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得由于技术迅速发展而产生的物质。

在这方面,最近举行的关于环境与发展、人权、人口与发展、妇女、社会发展以及最近的关于人类住区等6个世界会议和首脑会议都将重点放在保护个人以及逐渐创造社会权利框架方面。

在社会领域,这些会议所产生的一个看得见的结果是,一些国家建立协调机构,以执行签署的各项协议。但是,鉴于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悲惨现实,这些努力并不够,这意味着联合国系统在国际社会领域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必须在联合国以及在里约热内卢、维也纳、开罗、哥本哈根、北京和伊斯坦布尔签署的各项协议背景下加速执行进程。

在本系统各机构范围内,特别是在经济及社会委员会及其各职能委员会范围内,现在已经采取第一批步骤。令人鼓舞的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负责可持续发展、妇女、社会发展和人口等问题的机构都通过了多年议程,作为这些会议的后续行动。

同样,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所达成的各项协议包括决定在2000年举行大会特别会议,评价各项协议执行情况。

在这方面,智利提议建立一个本大会工作小组,该小组以上述特别会议为基础,可以为上述8个会议提供后续行动,同时考虑到发展议程,这样在2000年,大会可以对1990年代的执行情况和各种承诺进行广泛和协调的评价,并且为今后的工作提出必要的建议。

最近几年里,拉丁美洲在自由贸易方面迈出了巨大的步伐。本大会已经听到关于南锥体共同市场(南锥市场)所取得的进展,智利最近加入该协定以及南锥市场与安第斯集团和墨西哥就类似协定进行谈判的决定。这些成就以及其他分区域集团例如中美洲共同市场(中美洲市场)以及加勒比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所取得的进展都显示,在拉丁美洲出现了推动一体化的新动力,其基础经济思想与过去的经济思想不同,但是仍然符合我们各国人民之间一直存在的追求团结的政治意愿。

智利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些区域的发展,然而,这些区域进展中没有一项可以代替多边主义。智利仍然认为,对全球经济以及对每一个国家而言,建立一个多边体系,使其具有明确的谈判和解决争端体制结构,以制定标准和惯例,保证全世界的自由贸易,这仍然是最好的选择。

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向坚持我们的谈判应该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贸易组织)的多边框架。拉丁美洲要求加入,这样拉丁美洲可以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而不是与全球经济隔离。我们的双边和区域协定是以开放的区域办法为基础的。将这一点付诸实施的最好证明是,在一体化日益增加的这个时期里,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我们地区各国对外关税壁垒也大幅度下降。

最近几年出现的最有希望的发展之一是通过建立贸易组织加强多边贸易体系。一个常设多边论坛的存在意味着可以将更多的经历用于执行所达成的各项协议,并且为谈判中不断取得进展以及开放世界贸易提供一个体制框架。

在这方面,智利非常重视将于1996年12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乌拉圭回合后续会议。这是贸易组织框架内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会议中的第一次,这次会议至关重要,可以确定新的机制到底有多大的效力。

在过去几年中,世界上很多区域和国家在扩大和加强民主和对人权的尊重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特别是拉丁美洲在民主的方向迅速发展方面的经历是历史上空前的。与此同时,政治对话和区域协调大大增加,这主要反映在里约集团中,该集团进行积极而有成果的活动迄今已有十年。

这不仅没有使我们自满自足,反面更加突出了我们的以下关切:在世界很多地区,仍然存在着大规模违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局势。这些局势有些关系到我们前面提到的和平与安全问题。

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人民对这些制度的支持越来越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确保稳定、有效率和透明的政府。民主政府的合法性与他们对选民负责有密切的关系,但在很多国家中,仍然存在腐化、无效率和对社会需要缺乏敏感。这损害民主的合法性并突出表明它的脆弱。

我国总统爱德华多·弗雷的政府已将民主治理作为预定于1996年11月在智利举行的第六届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最高级会议的主题。为此目的,我们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得到联合国的宝贵合作。我们希望,今后,我们组织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将扩大到其他区域。

过去几十年中人类最大的变化之一是我们认识到,在人类控制下的自然是脆弱的。直到我们看到了所造成的损害,我们才认识到大自然的脆弱性,而这种损害经常是无法弥补的。因此,人类对自然的责任出现了一个新的方面。使地球上生活恶化的可能性意味着,我们的无穷的科学与技术力量必须受一项新的原则的指导:即分担责任的思想。

我们所面临的工作是艰难的,但我们的路途已经在1992年的环境和发展会议上标出。在里约热内卢,就基本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我国政府准备在当时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和承诺的基础上采取行动。自从地球首脑会议以来,智利已进一步发展了它的环境立法。我们赞同了里约宣言中我们认为是根本性的原则,例如预防环境污染、合作以及污染者的主要责任。我国已接受了要通过关于

预防性环境管理的最适当文书的义务。但是,我们还认为,社会必须在保护环境方面发挥首要作用;为此目的,社会各阶层必须更致力于此并更加负责任。

我国政府认为,还有必要强调世界社会对这个问题的政治承诺,因为这个问题是国际性的,在很多方面是全球性的。因此,我们非常重视所建立的机构的工作以及对在地球首脑会议上达成的协议的监测。

国际领域中的事态发展、所处理的问题的日益多样化、以及参与联合国工作的国家数目--所有这些都使恢复本组织改革进程的活力变得极其重要,以使它适应正在出现的现实和挑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必须优先重视统一的和多学科的作法。这是本组织的概念基础和紧急需要的改革进程的基础。这要求非常透彻地分析我们的多边工作的内容、本组织的议程、政府间组织的职能、我们的人力和资源、以及秘书处的结构。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进行不仅仅是空谈的,并使我们能够利用适应新现实的政策和组织来应付下一世纪的挑战。

智利希望重申它赞赏秘书长在这方面正在做的工作。在困难的预算条件下,并面临非常困难的政治局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已在他的权限内果断地开始了本组织的改革进程。

我们欢迎所有能够提高本组织效率,减少官僚主义现象并缓和财政问题的建议。但我们认为,不应错误地将联合国改革与行政和预算效率这个单一问题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说我们需要一个适应新挑战并把眼光集中在下一个世纪的组织,另一方面却把实质性辩论仅仅陷于削减费用和更好地控制资源,这是相当矛盾的。我们需要提高行政效率,但我们也必须重视实质性效率。我们的目标即是要精简本组织,也是要加强本组织。

最后,我必须提到比过去几年更紧迫的今年议程上的改革问题。安全理事会所作出的大量决定使联合国其他会员国日益希望更多地参与安理会的决定,以加强安理会行动的合法性和政治支持。

改进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产生了加强其可信性的新途径。已经取得了进展,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别

是在以下方面:与参加维持和平行动部队的派遣国之间的磋商,与可能受影响的与冲突地区相邻的国家的磋商,以及与可能受实施制裁的不利影响的第三国的磋商。

决定安理会决定的合法性和政治知识的第二个因素,涉及其组成。在这方面,智利认为,有必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大会自从1992年以来所审议的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名额问题。我们认为,存在着同意让德国和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普遍基础,同时,也普遍同意让每一个区域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常任席位,席位的占有国在区域级选出。

同样,为了满足代表性需要,鉴于在过去十年中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大大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应从十个增加到十五个,同时适当考虑到公平地理分配。拥有二十五个成员不会削弱安全理事会的有效性,而会增加其行动的代表性。

然而,我们希望强调,智利准备在此表现出最大的灵活性。这意味着我们愿意考虑其他会员国提出的同样谋求结合应该指导我们的决定的以下两个基本因素的其他建议:承认新的国际现实和使我们的系统的各主要机构具有代表性的合法愿望。

我们愿谈谈这些问题,智利认为,为了建立实现联合国目标所需的稳定和合法框架,这些问题是本组织未来几年内的主要任务。智利保证坚持支持完成这一最艰巨的任务,如果国际社会全体成员都有决心并参予到其中,这项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列支敦士登公国外交、文化、青年和体育事务大臣安德列亚·威利女士阁下发言。

威利女士(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祝贺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列支敦士登相信,他的领导将加强联合国实现《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能力。

在庆祝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一个后,再次估量一下本组织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缺点,以及首先确定我们必须采

取的措施,以便面对我们面前的挑战是适当的。在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上再次提及的议题之一是呼吁对联合国进行全面和有效的改革,以及提高其效率,减少其工作开支。

我愿表示赞赏秘书处,特别是行政和管理事务部和内部监督事务厅为满足这一需要而作的一切努力,后者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我们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便解决本组织还在与之作斗争的财政危机,这仍是一个事实。人们似乎是在需要进一步采取此类行动方面达成了协商一致,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在大会第五十届会议期间就如此迫切需要的措施达成协议。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大会设立的财政局势问题高级别工作组应在第五十届会议期间提出建议,解决财政危机,包括支付拖欠会费问题。我愿借此机会表示,列支敦士登政府支持欧洲联盟在这方面提出的建议。

我们支持人们为改革和扩大安全理事会而作的努力。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应该符合《宪章》中所载的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列支敦士登同意这些会员国的意见,它们认为,关于新的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分配问题,应该充分考虑为实现本组织的宗旨而作的财政上和其他方面的贡献,以及平衡的地理分配。

主席主持会议。

对于本组织的工作和可信性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另一个领域是维持和平行动,维持和平行动引起了世界社会的特别兴趣和关注。过去的经验表明,很清楚,联合国需要更好的装备,以使其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预防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的出现。如果我们要加强整个联合国的可信性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有效性,我们就必须确保给予每一个此类的代表团一个明确的授权,并使其拥有充分履行其授权所需的资金。为此目的,秘书长在其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中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建议。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大会设立的负责讨论《和平纲领》的工作组取得的进展,以及处理《和平纲领》具体方面的四个小组中的两个已达成临时协议。我愿表示希望,另两个分别必须讨论预防性外交和调解以及冲突后建设和平等重要问题的小组也能不久后完成其工作,以便能够通过一个关于《和平纲领》的全面协议。

过去几年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很清楚地表明,我们应当给予预防性外交更多的注意力。预防性外交能够防止人类遭受痛苦,而且能够相当大地减少人们所付出的代价。在需要人们紧急采取有决心的预防性行动的局势中,在布隆迪出现的局势便是其中之一。在那里,对人权大规模侵犯的形势以及该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危险依然存在。事实上,人们不安地注意到,国际社会未能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以预防布隆迪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在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列支敦士登提出了一项关于自决权的倡议,对冲突预防问题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们已多次表示,今天,大多数的武装或其他暴力冲突已不在是国家间的冲突,而是国家内的冲突。此类冲突的根源经常是居住在同一国内的社区之间的紧张局势。列支敦士登的倡议突出强调在有关一方诉诸暴力之前找到一个和平解决此类局势的方法。自决权的行使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现在,对我们而言,似乎是越来越需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看待这项权利,对它进行进一步发展和调整,以使其适应在今日世界上盛行的情况。

许多国家内冲突的情况表明,国际社会需要适时地制订机制,使生活在一国内的社区能够根据现有国际法以灵活的方式行使自决权。作为列支敦士登为庆祝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所作贡献的一部分,普林斯顿大学制订的列支敦士登研究方案旨在为制订上述机制提供进一步的知识帮助,我愿借此机会感谢所有那些继续支持我们这项努力的国家。

作为一个小国,列支敦士登极其重视加强国际法和有效的裁军。因此,我们曾积极支持澳大利亚代表许多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使我们能够在裁军谈判会议中的漫长和非常艰难的谈判之后,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将使我们致力建设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目标更进一步。列支敦士登政府认为,这是关键性的一步。因此明天我将代表列支敦士登在《全面禁试条约》上签字,而且我要表示,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的国家也这样做。

一年前我们在北京开会,一致通过了一份《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份文件代表了对实现让世界妇女

享有平等、发展与和平目标的国际承诺。在列支敦士登，我们正在着手准备落实《行动纲领》，特别是动员妇女参加政治和提出她们的候选人；为女孩提供特别的学术和职业指导；采取措施便利职业和家庭生活相融合；以及提高对于妇女与儿童施行暴力问题的认识。

和平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先决条件。不幸的是，侵略和武装及其他形式的冲突在世界许多地方依然存在。在导致武装冲突的决策中，妇女很少起任何作用，但是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时候她们为维持社会程序作出很大的贡献。我们认为，妇女可以而且应该在解决冲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将特别欢迎任命更多的妇女担任秘书长特别代表。

近年来，人道主义援助的需要急剧增加。在人道主义救济领域起着重大作用的联合国系统几乎已被最近的危机推到极点。复杂的紧急局势增加了对匮乏资源的需求，有人已经批评，由于集中力量进行紧急救济，因此很少花力气制订恢复方案。人道主义必须发挥重要作用，确保从救济过渡到重建。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联合国系统为人道主义行动提供框架与连贯性，迄今仅仅四年。

给世界各地的个人与社区带来极大破坏的杀伤地雷是一个人道主义悲剧。无辜的平民，特别是妇女、儿童、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面临的威胁最大。此外，地雷妨碍遭受战争蹂躏社会的复兴与重建。按照其发展和促进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使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断呼吁重视有可能破坏人道主义法的武器。我们赞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努力。我谨重申，我们呼吁彻底禁止这些致命武器。

我们希望，在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期间，我们将能加强50多年来国际社会不可缺少的联合国，并在本组织所代表的各国人民的心中提高联合国的信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新加坡外交部长贾亚库马尔先生阁下发言。

贾亚库马尔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去年，我们在喜庆的气氛中聚会。然而，没有不散的宴会，我们现在

面对联合国有可能变得无关紧要的危险的严峻现实。联合国在21世纪中的作用并不是想当然的。

痛心的事实是，联合国今天在管理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战略和经济问题方面很少或者没有实际发挥作用。但是情况并非一贯如此，我们记得联合国在减轻非殖民化的巨痛中起过重要作用。即是在冷战高潮时期，联合国也是超级大国可以用来管理地区代理人冲突，有时甚至是直接的核对抗的举足轻重的工具。

联合国同过去的这种差别，应该使我们对联合国的现在和将来深为担忧。我们不能再推迟严肃地审查各项基本问题。鉴于这一原因，我国代表团特别满意地看到，在决定联合国前途的这一重要转折时刻，马来西亚担任大会主席。我们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人知道坦斯里·拉扎利·伊斯梅尔的献身精神和清楚的思维。

主席先生，我最好也只能附和你在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有关改革的话；我们完全赞同你的意见。关于联合国需要改革的无休止的辩论没有带来什么真正的改革。这些辩论掩盖而没有澄清基本问题。辩论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需要提高效率，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支持。谁能认真反对提高生产率，改善管理和减少浪费。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干什么的效率？我们到底要一个怎样的联合国，目的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联合国的宗旨载于宪章头一条。然而，问题并非不言自喻。我们大家知道，联合国的第一个宗旨是：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但这是什么意思？冷战后对一份新的《和平纲领》的比较奢侈的希望已被证明是幻想。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失败提出了有关联合国在冷战后作用的麻烦问题。联保部队结局的基本教训不仅仅是安全理事会如何变成平息安理会某些主要成员国内问题的政治舞台，也不是联合国不能做它的主要成员不让它做的事这一明白的道理。联合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真正悲剧是，当各主要大国最终决定认真对待它们觉得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时，它们所选择的工具显然不是联合国。

其次，我们都一致认为，贫困滋生冲突，贫富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然而，《发展纲领》却陷入了对可持续发展

定义的空谈理论的争论。我现在并不是要说明目标不重要。但实际的问题并不是那么复杂，因为最不发达国家最急需的不是学术上的诡辩，而是提供帮助：帮助它们建立机构和制订政策，使它们能够融入全球经济。联合国没有充分应付这些挑战。

改革方面的僵局不仅仅是由于问题的难度，也不是由于利益的冲突。当然，在任何主权国家体系中，问题是棘手的，利益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联合国——按照《宪章》的设想就是——“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

那么为什么在今天联合国履行这一极其重要职能的能力却减弱了？我认为，这是由于它不愿充分应付我们时代两个最重大发展的影响。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其次是一个真正全球世界经济的出现。这两个事件的同时发生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根本性地改变各国相处的方式。然而，这些发展充其量在联合国只是得到不尽如人意的反映。任何国际组织如果脱离国际现实就没有未来。

冷战结束以来对联合国而言最明显的结果是会员数目大量增加。但是，会员性质上的变化却没有引起很多评论。在1945年，小国——我对小国下的定义是人口在1 000万以下的国家——占联合国51个会员国总数的59%。半个世纪后，在1995年，按照同样定义的小国在联合国180个会员国中占的比例相同。在1989年后加入联合国的26个国家中，有23个国家——超过了88%——也是小国。我想随着联合国会员国数目进一步增加——这是必然的事情——大多数新会员国也将是小国。

这是由于技术进步和冷战结束引起的国际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大小在决定一国的生存方面已不那么重要了。今天最重要的不纯粹是一国疆界的大小，或资源的多少，关键在于一国作为一个网络的一部分将自己融合进去的能力，大小在这方面是不相干的。

最重要的国际网络不是由国家间的关系构成的。重要的网络越来越多地由城市、区域和分区域间的跨国关系模式所界定。这些模式可能只是不完善地符合各个国家正式的政治边界。这再一次说明一国的大小或它的资源没有它进入这些网络的能力重要。

许多小国同时也是最不发达的国家，这是一个事实。鉴于国际财富的倾斜分配，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重要的一点是，国家不再自动或命中注定就是无能。它甚至可以成为一种有利因素。这使许多人鼓起勇气寻求自决。由于这些趋势削弱了首都控制它们边远地区的能力，许多人取得了成功。

经济领头，政治必然跟进。自相矛盾的是，全球化世界经济的日益一体化产生的政治后果却是政治纽带在某种程度上松动。我们从一些由各种成分组成的大国的实际解体中最明显地看到这种情况的后果。但这是例外情况。即使在更通常的情况下，即在正式的政治边界完好无损的情况下，较为单一的大国的首都对它们所有组成部分发出单一指令的能力显然在减弱。在所有地方，权力正在分散。这一趋势是一种新的国际现实。

我不想过份阐述自己的论点。只要主权依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组织原则，那么在国家间关系中就不能够不考虑使用武力。在战争中，国家的大小并非完全不重要，尽管技术已使它不象过去那样是完全的决定因素。但是，战争是一种国际关系的极端状况。在通常情况下，力量和财富的概念正被重新下定义，变得更加分散，它们的不同方面不那么集中在几个世界首都。等级体系仍然是国际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但在二十世纪结束之际“大国”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今天这个词听起来有些落伍过时。

在没有一个简单的战略敌人的情况下，主要大国冷战后外交政策的制订越来越局部化，它们的国内政治产生更大的影响。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大国组成部分的经济和其他利益也许与首都的利益相抵触。这些国家的政策的一致性正在减弱。一个单一国家利益的概念正变得有些含糊不清。

所有这一切正使得即使是最大的国家也越来越难以经常地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利用它们的力量施加影响，因为对对手的攻击很可能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动用权力的后果正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即使是对那些掌握着最强大权力工具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大国现在对于赤裸裸地动用权力有点更加谨慎，除非是例外情况和针对在全球经济中无足轻重的国家，这并非偶然。

我并不是说寻求各自国家利益的几个大国的互动确定国际关系的传统概念已完全过时。但这当然是对当今世界不恰当的描述。军事力量的平衡仍然是重要的。但是,构成传统力量均势基础的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之间的严格界限正变得越来越含糊不清。

现在所有这一切应该使多边协商进程对每个人的吸引力增大,而不是减弱。糟糕的是,情况并非如此。联合国各种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此。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正在按照不断变化的国际体系进行调整。的确,它们没有别的选择。但它们并不都选择在联合国内或通过它这样做。在联合国,大多数我们传统上所指的“强大”国家都以不同程度的不安对这些新的国际现实作出反应。

一些国家因它们控制甚至其边界内事件的能力减弱而感到不安,它们对自己没有能力对一个被认为是不听话、陌生和好管闲事的组织强加它们的秩序感到沮丧。另一些国家感到它们的地位和威望受到威胁。心理调整总是很难的。因此,在联合国内它们本能的反应总的来说是顽固地维护现状,这是不足为奇的。

在关于联合国改革的讨论中,这个简单的事实往往由于使用深奥难解和拐弯抹角的用语而变得模糊不清。主席先生,你讲话简单明了,不玩弄辞藻,让真相人人皆知的声誉令我感到鼓舞。如果联合国遭到排斥,那么就应该明确责任在哪里。这最明显体现在两个最关键和相关的方面: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和财政状况。

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强调其规模及组成,尤其是接纳新常任理事国的可能性。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认为,假如同意增加常任理事国数目,仅增加工业化国家是不能接受的。很多国家一致认为,当就扩大安全理事会取得协商一致意见时,日本和德国就应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然而,对于新的常任理事国是否应享有否决权却仍然存在关键的模糊性。尤其难以想象主要大国会让发展中国家对其政策享有否决权。因此,僵局仍然存在。

各国还广泛同意: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应构成一种全面性的一揽子方案,包括改变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以实现更大的透明度并让全体会员国参与。然而常任理事国一直不愿接受除对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最表面性改动之外的变化。然而,这对联合国中由小国组成的大多数来

说,是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最关键方面。小国不想成为常任理事国。但是作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的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及其决策进程,是其重要与合法利益所在,因为它们对其安全产生直接影响。

目前摆在桌面上的最重要和最具创意的建议之一,就是重新解释《宪章》第三十一条。这将允许非理事国在审议影响它们的问题时能够更多地参与安全理事会的非正式磋商。极为令人沮丧的是,这一并不过份的建议却受到几乎每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坚决反对。实际上,大多数常任理事国甚至拒绝予以讨论。应允许受一个具体局势最直接影响的方面向对联合国可能就该局势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最具影响力的机构直接提出其看法,这确实是一项基本正义的根本原则。实际上,这正是为什么一开始就在《宪章》中列入第三十一条的原因。其意图显然是使大国的领导权利符合主权平等的原则。

非正式磋商是多年演变而成的一种新方法。安全理事会今天所作出的所有最重要决定,都是由常任理事国以非正式方式作出的。甚至非常任理事国对实际决策的参与,有时只是象征性的而非具有任何意义。正式会议显然只是一种设计好的仪式,以盖上最后批准的印章。对第三十一条的重新解释将不要求对《宪章》进行修正,不意味着非理事国必须参加所有的非正式磋商。因此,这对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并没有真正的威胁,这只是一种重要的改革,无疑将通过使安全理事会决策更符合时代的特征来提高这一进程的合理性、以及广泛可接受性和效率。

我不想被人误解。我并不是说安全理事会的规模和组成不重要。我理解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成为加新常任理事国的要求的长处。新加坡支持作为一个全面的一揽子方案的一部分而在安全理事会中最多增加五个新的常任理事国,这一方案还可包括由此调整非常任理事国的数目以维持平衡的比例。然而鉴于国际关系中目前正在出现的深刻变化,拒绝严肃讨论甚至具有严重模糊之处的成员国组成之外的任何问题,将类似于试图通过将19世纪大国政治的模式应用于联合国来使它为21世纪做好准备。

同样抵制认真顾及联合国中由小国组成的大多数成员的合法利益,也突显了联合国的财政问题。人们都同意,

联合国现金周转问题的关键原因,就是会员国不能及时和全部付清其会费。

不同会员国未履行其法律义务有各种原因。一些国家是因为贫穷。但谁也没有认为最大的债务国缺乏支付能力。它的论据是必须降低其分摊的会费,因为其国内政治协商意见的情况不允许它维持其目前联合国预算的份额。因此而提出的论点是应更广泛地分配财政负担。我并不对这种论据不屑一顾。它们反映出我刚才称为一种新的国际现实的确定和行使大国权力的日益增加的困难。因此,我能够同情这种论点。但是在有用的时候挑选某些新现实,而在不方便的时候则忽视某些现实的做法,在政治上是不能接受的。

几个常任理事国抱怨它们所承担的财政负担并试图予以更广泛的分散。然而从没有一个大国建议应相等程度地在由小国组成的多数成员之间分散它们对联合国关键开支决定,尤其是维持和平行动开支的控制。却指望这些小国承担大国所不想管的财政短缺。所有常任理事国都不愿在最表面地重新审查其权力或其与全体会员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做任何事情。关于唯一普遍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联合国机构——大会的作用的讨论,主要触及了周边的问题,例如全体会议的时间、一般性辩论的长度以及大会工作的安排。

谁都应同意:将联合国建立在牢固的财政基础之上必须是一项共同的努力。我们当然都同意。但它确实必须是一种涉及公平交换的集体事业。政治上的抵制同时产生,因为显然期望大多数人给予,而只有少数人获取。如下历史事实突显了这种抵制:除法国之外的所有常任理事国的会费百分比多年来持续降低,而它们的特权却并未减少。联合国实际上多次作出所要求的财政调整,但迄今却未使最大会费国的支付记录发生任何明显的改变,回想到这一情况则更增强了这抵制。

我并不是说这种状况是一项蓄意推行的政策的结果,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对无论由于何种原因而不能支付其会费感到高兴。但是在政治上不适宜和根本不公平的是:要求大多数国家承担更多的财政负担,而同时却不准备让它们在最重要的开支决定上享有更多的权力。把发起维持

和平行动的权力与应如何及由谁支付这种行动几乎完全分开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联合国是少数会员国积欠最多的帐单而其它国家都支付帐单的唯一组织。

顽固维持现状更令人吃惊,因为人们要求的莫过于最起码和逐步地调整大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关系,以让广大会员国更多一点地参与并共同负责具有最大所涉预算问题的决策进程。

当然,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我并不声称它是一个漠不关心的国家。我们作为一个小国,热心关注并生机勃勃地参与联合国的未来。然而,我们提醒大家注意改革面临的实际障碍并不是仅仅为了小国利益。

我指出了全球化世界经济的一个自相矛盾的政治后果,就是各地离心趋势得到某种程度的增强。因此,如果要不让这种情况导致冲突,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需要一个普遍的国际组织发挥一种融合作用。只有联合国能够发挥这一作用,假如联合国不存在,我们就会不得不它。

但是,只有在小国的合法利益未受忽视和大多数国家不被声称代表它们的这个组织日益疏远的情况下,联合国才能发挥这种集成作用。

有些人可能将大国对待联合国改革的言词和现实态度之间的差距斥之为纯属虚伪。我不接受这种简单化的解释。对于大国必须作出的更为复杂和痛苦的心理调适,我感同身受。大国必须鼓起政治勇气开始这个进程并接受变革的现实和必要性。我呼吁它们同我们占大多数的小国合作,使联合国真正成为大家——它的所有会员的联合国。

威信并不单纯取决于权利,分享权力并不是失掉权力。新的国际现实正在使国家权力的得失所系的概念过时。一个可靠的联合国,一个不被视为仅仅是其各个最大会员国工具的联合国,将成为对其所有大小会员国的外交政策更有效的工具。

最后,主席先生,我要说我国代表团期望明年同你以及所有其他会员密切合作促进实现一个集体理想:在21世纪实现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有效和团结一致的联合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荷兰外交大臣H.A.F.O.范米尔洛先生阁下发言。

范米尔洛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同代表欧洲联盟发言的我的同事爱尔兰的迪克·斯普林部长一起祝贺你当选大会主席职务。作为在联合国事务中进行长期杰出工作的一名代表,由你指导我们来年的工作,特别称职的。

在本世纪行将结束之时,我们必须自问:联合国处于何种状况。它是否作好面对前面的世界的准备?它是否作好满足尚待出生的几代人需求的准备?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实可能仍然是明天的现实,这些现实是令人畏惧的。我们正在目睹日益增加的贫困、贫富裂痕不断扩大、移民、人口压力、粮食库存减少、对公共卫生与环境的公害、毒品、恐怖主义、内部冲突和大规模违反人权;一系列令人气馁的情况。

面对这些现实,鼓吹本组织的改革等于是说大实话。当然我们需要改革。显然,过去几年中联合国已变为使外人却步的体制丛林、一个仅仅由于这个原因而大大丧失其信誉并亟需振兴的组织。我们必须进行改革。没有其他替代办法。

我们需要进行改革以重新获得我们的所失,即不是权力,而是权威。权力是在许多不同级别上操纵,而且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多地操纵权力。在影响会员国对其权力的使用方面,联合国并不能有太多作为,而且联合国本身的权力也是相当有限的。但是51年前大量给予联合国的是权威:道义权威和法律权威,这种权威来自代表国际社会讲话,发出公众的心声和超越既得利益。确实,如果本组织要以实力和信任地位对待未来,如果我们期望世界各国团结在联合国旗帜下,联合国的权威必须是完整的。实际上权威应加强。

那么它是否在加强?这里需要说句清醒的话。在联合国历史上这一关键时刻,联合国看到其权威(这是它决不会嫌太多的一项商品)受到损害和削弱。这项商品联合国太少了也不行。我谨着重谈一下联合国的授权在削弱的某些表现,并提出使其加强的一些前景。

第一,多边主义本身受到压力。许多国家不再把多边合作视为其外交政策的单独目标,而是视为它们根据其国家利益能选择运用或不运用的许多政策工具中的一个工具。已出现了国际领导的替代来源,并根据需要组成临时联合。联合国越来越被视为捍卫一国具体利益——甚至是短期利益——的手段,而不是解决紧迫世界性问题的更可取的途径。以这种购物中心态度对待联合国,同创始国所签署的崇高原则形成了鲜明对比。

权威的逐渐丧失也是失望和沮丧造成的。联合国一度曾被确立为国际合作的理想形式。尤其在冷战结束后,期望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几十年来,世界曾受到控制,两大势力集团不和,联合国丧失了作用能力。现在联合国终于能够开始发挥最初为其所规定的作用了。

不幸的是,这一情况并未发生。联合国介入诸如纳米比亚、萨尔瓦多和莫桑比克的成功事例由于对无法完成的使命(如在索马里、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的失望而黯然失色。会员国自己决定将这些使命委派给联合国并不能阻挡伴随这些使命而来的权威的腐蚀。

沮丧已超过了有效性和高效率,这两大品质避开联合国已有好久了。将缺乏这两大品质单单归咎于秘书处是容易的。联合国政府间机构折磨人的工作方式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有很多批评。联合国的成绩记录在许多方面当然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从整个联合国系统广泛的领域来看更是如此。它在国际法、人权、发展、人口危机、医疗保健、妇女地位、裁军领域取得的成就是信手拈来的例子。事实上成绩单是很长的。然而,抨击联合国不知为什么成了时下的时髦,甚至成了大选雄辩的工具,要这样做可以转移人们对内部问题的注意力,不管怎样,无论是真正的问题还是想象的问题,无论是合理的批评还是不合理的批评都使联合国的道义权威大伤元气。

接下来就是财政状况。从很早开始,支付或不支付会费表明了对联合国的支持率。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拖欠会费数目之高却是空前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本组织的潜力的信心和信念在下降,这令人悲伤。目前的

财政混乱状况并非是造成联合国困境的主要原因,而是其结果,金库空空如也会最终使产量下降。产量下降会进一步损害权威。而受损的权威反过来又使一些人更不愿意缴纳会费,从而进一步加剧财政危机。因此,我们可能发现联合国陷入了一种每况愈下的循环。一些会员国目前的支付习惯相当于一种自我验证的寓言。更糟的是,这种习惯背离了联合国赖以建立的原则,不全部、迅速和无条件地缴纳会费将进一步削弱联合国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正是50年前那些国家赋予本组织的。

如果说在一个政策领域联合国已丧失了许多权威并可能继续丧失权威的话,这个领域就是和平与安全。以布隆迪为例,今天那里的人道主义和政治局势令人担心,我们看到种族灭绝在扩大,恐怖到处存在。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数千名无辜男女和儿童丧生。发生一次种族灭绝大爆炸仍然是很实在的威胁。我们不能让另一场1994年在卢旺达发生的那种灾难再次发生。那年,我们曾声称我们几乎无法看见灾难来临。在布隆迪问题上,就不可能就有这样的借口了。凶兆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再次失败,第二场种族灭绝确实发生,联合国就会更惨重地丧失其权威。

我们怎么做才能加强联合国的效力并帮助它重获它需要的权威来完成其任务呢?我们怎样才能扭转走下坡路的循环呢?

要使联合国有效力,那就必须以综合方式使用国际社会可获得的各种工具。这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尤其如此。在此领域,需要以协调的方式使用政治、军事、社会经济、选举、人道主义、重建和发展方面的援助。因此,一种综合的方法是预防和制止冲突的唯一方法。联合国需要在必要的时候和必要的地点在场,这就是可以从非洲最近发生的危机中急吸取的教训,例如在卢旺达和索马里。在这些地方,由于缺乏连贯性,对悲剧暴力作出的国际反应没有取得效果。

预防性外交和冲突后建立和平都要求在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联合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冲突上,而一旦冲突发生在早期阶段消除冲突。

我在两年前向大会讲话时提请大家注意联合国对严重的冲突局势及时作出足够反应的能力,或者说,联合国

缺乏这种能力的问题。从那时以来取得了一些进展,采取了一些不大的中间步骤,这些步骤从长远观点看将使联合国具备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更好的能力。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了联合国备用安排制度,并同一些国家建立一个这个制度下高度戒备的联合国部队。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和平方面的决策的透明度也改善了。一个快速部署总部将不久增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能力。

预防冲突的前景如何,还得看联合国是否有能力对付对其权威的另一种威胁:不受惩罚的现象。国际社会确实有足够的手段把那些犯有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的人绳之以法呢?在布隆迪和利比里亚发生的事令人痛心表明,逃脱惩罚的可能性公开鼓励犯罪而不用担心受到惩罚,并且妨碍未来的和解和重建。关于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问题的法庭是自纽伦堡以来国际社会为判决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所作的唯一最重要的努力。我们不能让这一努力失败。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法庭已起诉了一大批人,只要它不能获得对其中更多人的拘留权,它就会遇到严重的问题。目前的局面会很快削弱这个法庭乃至整个联合国的权威。

我认为特设法庭的建立再一次突出表明需要迅速创建一个永久性国际刑事法庭。该法庭一旦建立,就更有必要使那些被指控犯有上述罪行的人受到审判,联合国应该加强它确保逮捕、引渡和审判受到上述指控人的能力。

如果联合国有一个其道义法律权威能发挥极其重要作用的领域,那就是人权领域。在这个领域,本组织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然而可以也应该作出更多的努力,未来还有许许多多的挑战。

副主席威尔莫特先生(加纳)主持会议。

人们对人权更加注意,这将加强联合国的道义权威。在这方面,联合国的权威应牢固地建立在本组织1948年本组织通过的《世界宣言》的基础上。

“作为所有国家人民和所有国家的成就的共同标准”(第217号A(III)号决议,序言部分第8段)

换言之,作为一个普遍框架。45年后,联合国会员国在维也纳再次讨论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人权普遍性。

然而人权普遍性受到压力。自维也纳会议以来,关于所谓的文化特殊性的讨论似乎在逐渐削弱人权普遍性,某些国家政府声称,由于它们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不能用与其他国家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它们的人权情况。

让我们不要弄错。在世界各地,人们看待人权的方式有所不同。如果我们根本否认这种差异,将不利于正在联合国进行的对话。确实,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铭记各种宗教和伦理价值观念、文化背景以及哲学信念,这些东西本身都受到《世界宣言》的保护。但它们与人权以及与普遍性概念的联系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联系。国际社会一年前在北京通过的《行动纲要》比任何文件都更准确地表达了这一点。正如我们在北京商定的那样,文化差异非但不缩小普遍性的范围,反而应该促进充分享受人权。本组织会员国在维也纳同意,无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如何,它们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更多地强调人权需有更多的财政资源。应该增加联合国预算中用于人权的部分。这反过来将在今天仍被剥夺了人权的大众的眼中提高联合国的道义权威。如果让这个方案逐渐消失,将产生相反的效果。

大会是所有会员国都参加的唯一联合国机构,最引人注目。联合国的信誉和权威与大会的行动密切相关。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机构眼看其许多决议被忽视。我们应积极努力给大会的活动注入新的活力,使其成就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两个星期前,大会有效地履行了它的责任,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世界机构通过这项《条约》,使宣布核试验为非法的新准则具有权威。我国被要求主持这些谈判,深感荣幸。通过《条约》有助于消除一切核武器,这是我国始终全力追求的目标。我们志在使其能顺利生效,但即使在《条约》未生效前,联合国的权威也将使任何国家更难以采取违反《条约》的行动。

应该更多地注意联合国开展的那些不完全是政治性或不完全与安全有关的活动,即社会经济方面,以及加强联合国系统处理诸如贫困、人口、粮食安全、都市化、妇女平等以及环境等事项的那些部分。这些领域对世界

的未来以及对这个星球的生活质量是至关重要的。本组织还在一些领域特别有资格查明和辩论各种问题,它已在这些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突出的有成效的活动。近几年的系列世界会议有助于提高联合国系统的权威。这些会议为联合国和各会员国制定了今后几十年遵循的议程。将于11月举行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也应这样做。这次首脑会议将面临在联合国成立100周年时世界可能必须养活100亿人的严重问题。

当然,可能有这样的危险,即人们再次寄予过高的期望,失望将再次导致联合国丧失权威。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必须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联合国将在倡导、协调和监测领域发挥主要作用。虽然联合国本身通过其实地行动有助于执行工作,但会员国对国家一级的全面执行负有首要责任。它们能够共同确保国际社会达到它为自己制定的目标。

联合国的权威岌岌可危,这种权威不会在一声霹雳中消失。而会在呜咽声中消亡。它会逐渐地消失,而不在任何时候敲响警钟,这样本组织很可能就滑到世界舞台的边缘。联合国需要新的方向和目的感,以再次成为《宪章》制订者所设想的人类灯塔。这就需要本组织所有会员国作出持续努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让我们很好地利用这些时间。

代理主席先生(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科威特第一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谢赫·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阁下发言。

萨巴赫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极为高兴地代表科威特国向拉扎利先生表示衷心祝贺,祝贺他担任大会第51届会议主席。

鉴于他的个人经验和才能,我们相信他将能够有效地指导我们的讨论取得圆满成功。因为他代表一个姐妹穆斯林国家,我非常高兴借此机会强调马来西亚和科威特之间的伊斯兰兄弟般关系。

我也很荣幸借此机会对大会上届会议主席在那一届历史性会议上所作的出色努力和贡献表示敬意。

科威特骄傲和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的重要成就,尤其是在加强本世界组织在全球和平、安全和发展领域的职能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和奉献。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一直努力改组联合国,使其更符合寄予它的愿望和期望。我想特别提及秘书长为了压缩经费并使其合理化,为了精简行政结构,为了重组秘书处以反映全球舞台现实,已经采取为具体步骤。因此,科威特赞成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采取的立场,支持他全留任的努力,以便继续执行其振兴联合国的改革方案。

去年,在普遍承认联合国系统辉煌成就的背景下,国际大家庭庆祝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这些成就包括,仅举几个方面的例子:协助许多国家取得民族独立,确立《宪章》所载原则,包括自决权,加强国家之间文明行为的准则,坚持正义与平等,以及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也许,联合国最辉煌的成就,是在世界很多动荡地区采取的维持和平行动。最近,这些行动以在发生自然灾害、内战时进行救济形式,以及选举监督的形式增加了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方面。

我们把联合国看作是各国辩论人类前途的论坛,以期增进人的福祉、尊严和基本自由。地球村的当代生活日趋复杂,不断出现的普遍而紧迫的问题千变万化,都需要通过联合国进行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必须承认,联合国继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最严峻的挑战是危及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制度的民族和地区冲突。其他紧迫问题包括人口爆炸、环境恶化、缺水,荒漠化、粮食短缺、南北差距增大、区域军备竞赛、核武器的威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发展问题、经济和贸易发展障碍、取消对自由贸易的限制,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人权问题。

为了使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国团结起来支持应对世界所面临的根本变化的方法,我们就必须相信联合国具有以多边方式处理全球性问题的能力、潜力和机制,积极地向联合国提供经济、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并认同其原则和宗旨,向联合国预算全部付清摊款,积极奉行承认和尊重其他成员国的权利及正当关切的真正和平政策,以期建立符合国际行为准则的地区秩序。因此,区域安排应该遵循已经确立的公正准则及国际法和条约准则。

在这里,我们必须确保尊重人权,并且保护人的尊严和选择自由。在这一方面,毫无歧视的人类发展对社会的全面经济,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应该优先重视这个目标,而不是把国家资源浪费在武器上。我们必须勇敢地对付恐怖主义,调动全民意志,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努力,铲除这一折磨强国与弱国,穷国与富国的祸害根源,因为归根结底,恐怖主义不服从理智,它源于偏见,伤害无辜,并诉诸武力,以及拒绝对话。

在此背景下,无可争辩的事实仍然是,当今世界在安全以及普遍关切问题上相互依赖的。在人类多数被推到困苦和贫穷的边缘时,少数富裕者也无法独自舒适地生活。极为迫切地需要集体地进行概念上和物质上的努力,制订一项公共议程,为全人类谋利益。我们正是从这一角度看待振兴和调整联合国各机构以便跟上国际关系迅速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面,科威特密切注意正在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中进行的讨论。我们去年希望就安全理事会的调整和达成协商改革一致意见,以便同时庆祝联合国五十周年。迄今为止未能达到那个目标不应减少我们的希望。相反,我们要为那个目标加倍努力。我们的目标应是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和程序更加透明,它的决议应更忠实地反映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意志。它的组成应扩大以反映最近会员国数目的增加,体现国家之间主权平等,以及在不同区域中席位的公平地域分配。

安全理事会任何改革最终必须保证安理会会员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国进行集体努力,以遵守和执行其决议。安理会应该能够对任何不遵守安理会决议的政权显示其坚定决心。

一个说明问题的教科书例子是安理会针对伊拉克当局采取的,并得到整个国际社会支持的公正立场。近在1996年6月23日,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首脑特别会议闭幕时发表的最后声明中敦促伊拉克政府:

“不要采取任何旨在对其阿拉伯邻国发动挑衅的的侵略性政策,并执行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有关决议,尤其是规定其采取释放所有科威特和第三国俘虏和被拘留者,归还没收的财产和遵守赔偿机制的决议。他们认为这是确保取消对伊拉克实行的的制裁

的正确方法,并且是为伊拉克恢复其在阿拉伯间区域秩序中的作用创造的适当条件”。(第A/50/986号决议,附件第7页。)

这个声明表明了阿拉伯领导人对伊拉克政权性质的认识以及他们对于充分执行安理会一切有关决议的重要性的理解。因此,伊拉克必须真诚地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说明所有科威特和第三国战俘和被拘留者的下落,以便结束人类这一幕悲剧。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每三个月在日内瓦召开一次的三方委员会,以及每个月在伊拉克和科威特边境召开一次的技术小组委员会,迄今无所作为。事实上,伊拉克利用这类会议为自己作宣传。

我在这里必需重申,战俘和人质的问题仍然是伊拉克政权造成的一个人类悲剧。对科威特人民和政府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至为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

伊拉克政权有法律责任同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特委会)合作,消灭它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库。特委会的惨痛经验说明,伊拉克政权不失时机地欺骗、造谣和隐瞒需要提供的情况。它甚至一再阻挠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视察员的工作,最近几次是在今年三月、六月和八月,从而迫使安理会通过第1060(1996)号决议,以及为警告伊拉克政权发表的主席声明。

科威特热衷于确保区域的安全和稳定,我们支持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我们赞扬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决心,以及他们坚持认为绝对有必要执行有关消除伊拉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意见。

考虑到伊拉克统治政权所引起的兄弟的伊拉克人民的苦难,科威特将继续向伊拉克难民提供人道主义的实物援助。我们还欢迎伊拉克和联合国就执行安理会第986(1995)号决议,作为减轻伊拉克人民苦难的第一步措施的协议。

让我借此机会再一次声明科威特的立场,即伊拉克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保护。同时,我们也理解,并实际上欣赏,联盟国家为保证伊拉克充分执行安理会所有有关决议所采取的一切措施。这些决议的实质和意向就是逐步建立一个以正义和稳定、法治、遵守国际行为规范、

以及尊重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条约等原则为基础的區域秩序。

鉴于科威特对阿拉伯湾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关切,而且由于我们和姊妹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亲密关系以及和友好邻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友好关系,科威特赞同海湾合作委员会关于岛屿问题的立场。科威特呼吁双方继续进行谈判,以通过对话求得公正与和平的解决。

在另外一个区域问题上,科威特充分支持姊妹国家巴林国最近为打击恐怖主义,以巩固其稳定和安全所采取的措施。我们的立场符合下列原则: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有着共同的命运,因而它们的安全和稳定是不可分割的。

科威特不安地注视着中东和平进程在以色列新政府当选后出现的停滞,新政府采取一系列违背马德里安排,主要是违背关于以土地换取和平公式,以及执行安理会关于在中东建立全面和平的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的立场。

最近的开罗首脑会议文件强调阿拉伯国家坚持和平进程,以便最终取得公正和全面和平,作为国际法下的一项战略选择。阿拉伯的立场要求以色列也作出相应的承诺,以便真诚而直率的努力,直到完成总的和平进程。这必须包括恢复各种权利,并归还被占领土,以及根据马德里制定的原则,保证区域所有国家的安全和战略平衡。

为了记录在案,请让我在这里再次说明,科威特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自己首要关切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我们和国际社会其它国家关系的中心。我们为这一事业投入了大量的工作和资源,因为科威特一贯认为,以色列没有履行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建国的合法权利,更不用说它完全不顾联合国决议以武力造成既成事实,夺取了全部巴勒斯坦领土这一事实了。我们要求以色列政府停止其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特别是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定居活动,并停止一切对这些地点的阿拉伯性质和法律地位所作的改变。难民问题也必须根据联合国决议得到解决。最后,应该根据巴勒斯坦人民的意志,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在这方面,我们谴责以色列挖掘并打开阿克萨清真寺西墙下的隧道,这构成了对圣址的亵渎,是对巴勒斯坦人

民的挑衅——实际也是对全世界所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挑衅。以色列使用强大的武力和暴力使大批的人死亡和受伤。我们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这些作为，并履行自己在保护这些圣址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性质的义务。

全面和持久和平要求相互容纳各方的权利、遵循达成的协议、行为诚实、避免挑衅性行为，以及具有长远眼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不对和平均衡的重要方面造成伤害。

以色列从戈兰撤出是检验它是否具有取得公正和平良好意愿的试金石。因此，鉴于和平进程是一个在达到最后目的前不应中断的连续统一体，科威特支持叙利亚关于从谈判停止之处，恢复谈判的立场。

科威特还支持黎巴嫩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需履行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一切条款的合法立场，根据此项决议，以色列必须完全和无条件地从黎巴嫩的被占领土上撤出。

我们的确相信，归根结蒂，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全球安全最终也会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认为种族摩擦和内战应该列入国际议程。我们欢迎至此为止为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剧得以结束，保证该国人民合法权利得以实现，所采取的和平措施。我们还欢迎最近在那里举行的选举的结果，并祝贺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取得他当之无愧的信任。

我们还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努力结束影响索马里、阿富汗和布隆迪的当前的悲剧。同样，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对国际社会的努力作出响应。

科威特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在本月早些时候所取得的成就，即通过全面禁止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这是普遍进行的长期努力和对更加安全的世界的希望的高潮。确实，全面禁止试验条约代表着走向消灭核武器的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世界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之后，国际社会成员在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合作出现了可喜的开放局面。我们希望，这一协定将增加发展中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出口量。科威特率

先主张消除贸易壁垒，正因为我们认为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不能把集体政治安全与各国经济关切分开。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欢迎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采取措施，重新调整其经济办法使其真正开放并采用自由市场政策。我们认为，这种结构调整将有助于吸引外国投资和加快和加快技术转让，最终在产生更自由的资金流动、更好的投资环境以及增加合资企业方面促进国际经济关系。

科威特认为有必要利用人的精力，根据对作为世界安全和经济福祉的基础的原则的共同理解缩小各国间存在的差距。我们还认为，对话和宽容地交换意见，加之以真诚和坚定地联合行动，将为改善国际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善良力量将联合起来消灭邪恶势力；“富国”和“穷国”可能大有互利交往的希望；理性和审慎将占上风，而歹徒、破坏者和残酷的暴君将继续退却。最终，生活条件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改善，该秩序的基础是促进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的公正原则。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鲍里斯·希赫穆拉多夫先生阁下发言。

希赫穆拉多夫先生(土库曼斯坦)(以英语发言)：首先，允许我祝贺扎利·伊斯梅尔先生作为与土库曼斯坦有着特别友好关系的国家的代表当选这一崇高职务。我还要表示深信，他在与联合国关系密切方面的广泛外交经验将使他能够有效地指导本届会议工作。本届会议有责任实现一些历史性目标。

主席的开幕词再次确认我们的期望将实现。在此，我愿感谢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在上届大会期间所做的工作，上届大会已成为土库曼斯坦历史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一致通过了关于我国永久中立的决议。土库曼斯坦总统萨帕穆拉特·尼瓦佐夫阁下在通过该决议前在这个讲台上讲话，强调土库曼斯坦将建设性地促进稳定我们纷争不断区域的局势，缔造和平和在本区域和区域间发展合作，从而采取所有必要步骤以重申其完全遵守联合国的原则。在过去一年中，土库曼斯坦为实现该目标采取了措施，在阿什哈巴德主持了塔吉克斯坦各派的三轮会谈，向秘书长阿富汗问题特使的特派团提供援助，并充当一些主要国际论坛的东道国。

土库曼斯坦作为二十一世纪前夕独立国家进入国际社会之后,发现自己有必要接受世纪交替的典型挑战。因此我们把努力集中在国际领域,力求成为世界范围进程的一部分,该进程的新趋势是走向注定于民族国家和主权的统一,建设性中立政策是我们对时代挑战的反应。

土库曼斯坦是一个亚洲国家,它注定成为参加全欧洲进程的国家之一。我们认为这一因素是独特的机会,以便在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欧洲联盟及其它组织框架内与欧洲人合作,并促进更好的谅解及南北合作的改善。

国际社会今天面对需要新的办法和创新性决定、深刻分析及预测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愿提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在土库曼斯坦设立研究本区域政治和经济局势的国际政治研究中心。该中心的工作应该符合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其任务应该是制定符合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具体战略建议。众所周知,远距离分析局势通常导致不正确的结论和预测。

集团之间的对抗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今天地缘经济区域作为主要行为者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根据面积和力量大小将国家分类侵犯中小国家的利益,这种做法已经过时。各国在现存国际关系体系中应该能够在普遍接受的规则框架内组织自己,但是它们应该根据自己的信条和原则这样做。因此我们支持旨在提出适当改变联合国、其机构和姐妹组织职能的倡议。

《联合国宪章》规定安全理事会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主要责任。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当今安全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包括一整套同样重要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军事及其它组成部分。从这一假定出发,我们支持应该在合理范围内增加联合国这一主要机构成员名额的建议,以便使它确保这种世界进程是可以管理和控制的。在安全理事会中,南北国家都享有平衡和适当代表权的问题也是同样重要的。

今天的土库曼斯坦是经历深远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转型经济国家。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发展纲领》在本届会议期间得到最后确定,这将有助于为执行这种国家发展方案的国家建立优先秩序和援助的制度。几乎不可能过高

估计联合国的作用,因为正是该机制应该确保对这种进程的最大客观性及容忍态度。新的独立国家不是在真空中出现。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特点、独特的民族和地理特征、历史关系和心态。每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和国家制度的模式。

从这个假定出发,我们支持多样性对世界不可或缺这个观点。然而,虽然所有国家都受制于国际法,但不能按单一标准或单一世界观规划各国人民谋求发展和繁荣的期望。二十一世纪的重要挑战是确保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能从多样性统一的观点彼此相待。因此,我们感谢联合国和具有全球政治和经济潜力的国家所给予的支持和谅解。

土库曼斯坦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它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碳氢化合物储藏地之一——我指的是里海盆地和我国其它地区。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管道基础设施,该基础设施将同现有系统一起确保给欧洲和亚洲提供我们的天然气。令我们高兴的是,土库曼斯坦作为一个出口国的利益同欧洲和亚洲消费者的利益相吻合。令我们欣慰的是,各邻国——伊朗、阿富汗、俄罗斯、土耳其、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任何分歧。

在这方面,我要谈及有关里海的若干问题。土库曼斯坦同所有沿岸国一样,也对其资源的未来和前景感到关切。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作出单方面决定或发号施令。现在需要的是里海各国为共同利益和各国繁荣建立一种充分信任和相互作用的制度。即将在阿什哈巴德召开的里海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将成为讨论所有这些问题的论坛,并将为召开里海国家首脑会议准备一个纲领。

土库曼斯坦反对在里海从事任何军事活动。土库曼斯坦愿确保一种各沿岸国国界自由航行的制度。里海的财富、其独特商务和矿物结构以及脆弱生态系统都要求人们采取全面和均衡的办法,而不谋求短期利润或政治优势。我们毫无疑问,所有里海国家都将能够在常理和尊重有关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为实现和平与安全的共同目标找出最佳替代办法。

土库曼斯坦对同联合国合作的一个领域特别感兴趣:即打击经销和贩运毒品。土库曼斯坦正在对这种邪恶进

行无情的斗争,并成立了国家协调委员会。今年初,土库曼斯坦加入了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和1988年《联合国限制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土库曼斯坦非常重视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合作,并同它签署了一项双边协定。1996年5月,土库曼斯坦同其它中亚国家一起并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合作,就有关管制非法生产、贩运和滥用麻醉药品的区域合作问题签署了一项备忘录。我们必须作出非凡的努力,以控制局势,击退邪恶的循环升级,并扭转毒品问题同打击毒品努力相应增长的局面。

土库曼斯坦在发展民主进程方面正在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和联合国进行积极合作,以便使新的一代长大后没有陈旧的心理成见和不良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民主、人权和人民享有财产和法律保护的权力都是普遍概念。但是,仅仅理解其相关性并不够,有必要在现实生活中一劳永逸地履行这些概念。我们所需要的是耐心和时间,以便使这种理解能够化为具体现实。因此,土库曼斯坦已创建一种民主、人权和提高国家地位的体制,人们要求这种体制依靠欧洲和亚洲的最佳经验并利用国际专家的支持,发展其自己的民主社会模式。人民不必当专家才理解这一点,无论外人提议采取的模式可能看起来多么完美无缺,该模式在应用于土库曼斯坦这样的传统东方社会时都可能无效,土库曼斯坦是一个继承了古老文明和伊斯兰文化价值观念的国家。土库曼斯坦人民还有一种特殊心态,他们几百年来一直为其生存而奋斗,终于获得了独立的机会,并有了其自己的民族特征。

本届会议议程将包括一项有关发展联合国及其机构同经济合作组织(经合组织)合作的项目。在1996年5月在土库曼斯坦首都召开的经合组织上届首脑期间,我国担任了今后两年期的主席,并打算作出一切必要努力,执行现由10个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各项大型方案。

经合组织是一个不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纯粹经济组织。其各成员都对这个问题持有共同观点。同样,我们认为,只有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善国家间合作才能使该区域各国

人民实现福利与繁荣。但是,为了使经济相互作用能够切实有效和取得成果,一些政治先决条件对发展经济相互作用来说不可或缺。我认为,一种政治信任气氛是首要条件。如果这种气氛成为我们彼此关系中的一个经常因素,那么它就将有助于推动各项新的大胆主动行动和具体项目。简单地说,我们必须信奉一种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哲学。我们的各种项目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得到顺利执行。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冲突局势仍在经合组织区域、即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存在。土库曼斯坦坚定地认为,这两国的古老而明智的人民有能力克服长期不信任和分歧的综合症。我们完全支持联合国的主动行动和邻国旨在和平解决的各项努力。

关于阿富汗,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是,那里的冲突已不再属于被遗忘的冲突类别,而成为国际努力的中心。土库曼斯坦总统萨帕塔穆拉特·尼亚佐夫通过同邻国领导人和秘书长进行不断磋商,以表示土库曼斯坦愿意积极参加谋求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工作。众多全球经济项目的命运,特别是向积极发展中的亚洲能源市场供应能源,都取决于阿富汗的和平。

下个月,土库曼斯坦将庆祝其独立五周年。今天,我们可以更明确地看到前景,并更好地理解我们应在什么领域发展同外国伙伴的合作。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并评估国内、区域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局势。积累的经验使我们能够表明,土库曼斯坦从政治和经济上说已在国际社会中找到其一席之地。我国通过不断渐进地迈向我国社会民主化和在经济中建立市场机制,正在融入世界范围的进程。通过与各外国伙伴密切地相互作用和奉行积极的外交政策,我们相信,这些任务将得到迅速和有效执行。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本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发言。

下午5时50分散会。